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许明武 谭 渊



德国文学中的 中国女性形象

谭渊 著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German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许明武 谭 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1CWW021）成果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前沿青年团队项目资助出版



德国文学中的 中国女性形象

谭渊 著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German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谭渊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11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许明武 谭渊主编

ISBN 978-7-307-19009-2

I. 德… II. 谭… III. 女性—人物形象—文学研究—德国
IV. I51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5805 号

责任编辑:徐胡乡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73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009-2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许明武 谭 渊

丛书编委 刘 芳 樊葳葳 徐锦芬 黄 勤

梁 丽 张再红 雷 蕾 刘泽华

王闰梅 冯学芳 唐旭日 施 渝

张建伟



总 序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经意间，外国语学院已经走过而立之年，缤纷蹉跎的岁月见证了它从幼婴到成年的转变。回望三十多载春秋，无论就人才培养还是科研创新而言，这所年轻的学院都已凝练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跻身于同辈中的前列。古人常说“温故而知新”，我们在即将跨入不惑之年的时刻回过头来，对学院的成长历程进行回顾，不仅必要，而且也正顺应了先贤的至理名言。

遥想当年，学院的开创者们筚路蓝缕，以工科院校基础课部为平台，从繁就简，聚焦大学英语教学，从实践中总结出宝贵经验，参与全国性课程研究及教材编写，出版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学习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发展阅读技巧》阅读教程、《中高级英语考试指南》、《英语水平考试指南》等一系列学习用书，以语义研究为代表、突显科技英语文体等领域研究的成果亦屡见不鲜。1986 年，我校获批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授权点，为当时少数几个拥有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点的理工院校之一。

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昔日的基础课部已然成为外国语学院。学科点已发展成为学科方向明确、研究特色鲜明、师资力量雄厚、应用性和研究性相结合的多语种人才培养基地。我院目前拥有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二级博士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湖北省重点学科），下设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四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学科教学（英语）和翻译两个专业

学位硕士点。学科点按照研究方向与特色成立了七个研究中心，为学科发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当前，学院中教学科研人才辈出。以语言研究、翻译研究、比较文化与文学研究为代表的多学科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理论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专门用途外语研究、国别研究方兴未艾，正逐步在各自的领域中赢得声誉。各语种教研人员也英姿英发，竞相为学院学科发展献力献策。

为更好地展望未来，学院结合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的特点，特地推出这套“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从本院教师学术成果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一批作品，并结合未来的学科布局集结成书。我们殷切期盼该丛书作为学院科研发展历程的见证，能使广大读者窥一斑而见全豹，充分了解本学科点科学研究特色。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学院将在国际文化交流、地方政治经济建设、引领学术发展等方面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院长 许明武

2016年8月30日于喻家山下

“窈窕淑女”的意象侨易之旅

——《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序言

叶 隽

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可谓现代学术中之显学，当初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乃是颇为厚重之作，而向达之同名作《中西交通史》还属发凡起例，其贡献更在专题深入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张星烺之《欧化东渐史》试图别出蹊径，但其所编的数卷《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更具史料基础性价值。文化关系的研究乃是一个急不得的工作，需要静下心来以平常心待之，因为在我看来，无处不侨，无处非易，那么文化的接触、交流、互动就始终处在一种周而复始的运动状态之中。而就更具体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来说，则本土学者之贡献值得重视，譬如早期的海外博士论文系列，陈受颐《十八世纪英国文化的中国影响》（芝加哥大学）、方重《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斯坦福大学）、范存忠《中国文化在英国：从威廉·坦普尔到奥列佛·哥尔斯密斯》（哈佛大学）、钱锺书《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牛津大学）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比较文学学者的努力，若干大型丛书相继问世，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21世纪初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等，试图集大成的著作，如钱林森、周宁教授联袂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煌煌17卷，显出一览无余的设计气魄，但就学术实质推进而言则很难达到“名实相副”。相比此类求全责备的大工程，我还是更倾向于先立定脚跟，脚踏实地做一些具体而扎实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徐

图渐进，设若如此则双边文学关系史的专题处理就成为必要。

在中德文学关系史领域，则德国学者尤其拔得头筹，有 Ursula Aurich《中国在十八世纪德国文学中的反映》(*China im Spiegel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 1935)，Horst von Tscharnier《至古典主义德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 München, 1939)等。而陈铨先生的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则可谓是中国学者开辟性的著作，其德文本绪论中的第一句话是中文本里所没有的：“中国拥有一种极为壮观、博大的文学，其涉猎范围涵盖了所有重大的知识领域及人生问题。”^①作者对自己研究的目的性有很明确的设定，即“说明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程序”“就中国文学史的立场来判断德国翻译和仿效作品的价值”^②。此后杨武能、卫茂平、方维规教授等陆续加入此行列，均颇有贡献。当然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有需要值得注意的倾向，按照夏瑞春教授的说法是：“在过去的 25 年间，虽然有很多中国的日耳曼学者在德国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但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研究了类似的题目，诸如布莱希特、德布林、歌德、克拉邦德、黑塞（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像席勒、海涅和茨威格，总是不断地被重复研究。其结果就是，封面各自不同，但其知识水平却始终如一。”^③谭渊教授致力于此领域之研究，但又别出蹊径，主要聚焦于历史上的“中国女性”的“德国形象”，即经由德国作家再描摹之后的“英雄造像”。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乃是《德国文学中的中

① 德文原文为：“China besitzt eine außerordentlich umfangreiche Literatur über alle großen Wissensgebiete und Lebensprobleme.” 见基尔大学哲学系博士论文 Chen, Chuan, *Die chinesische schöne Liter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 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 der Hohen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Christian-Albrecht-Universität zu Kiel, vorgelegt von Chuan Chen aus Fu Schün in China, 1933, S. 1.

② 陈铨：《中德文学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 页。

③ 夏瑞春：《双重转型视域里的“德国精神在中国”》，载《文汇读书周报》2016 年 4 月 25 日。

国人——以席勒、德布林与布莱希特著作中的中国人形象为重点的考察》^①；前些年又出版了《歌德席勒笔下的“中国公主”与“中国女诗人”——1800年前后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德影响研究》^②；最近鼓其余勇，完成这部《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确实可以说是有其学术发展的惯性延续，值得充分肯定。

从性别主义的角度来看，学者当然会强调“女性”的特点和视角，但我还是更喜欢用一种天然的审美眼光而超越简单的“权力叙事”，所以曾写过一篇《风仪贵兮，美人绰约——席勒戏剧中的女性》的文章，就是关注到席勒笔下的女性实在有着太可向慕和书写的风景，而谭渊教授美其名曰“探寻中国‘她者’的足迹”，一语双关，将“他者”和“她者”巧妙地互文相应，其背后的理论意识豁然显焉。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种学术理论关注是多方面的，他强调“在研究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时必须由中国素材的传播轨迹入手，从译介学、文学关系史科学、文学形象学、变异学、侨易学的角度开展对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的全面梳理，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对中德文学间的相互作用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式进行探索，对‘世界文学’图谱中的中德文学互动关系进行建设性的解读”。这无疑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描述，让人读来心怦怦然向往之，但如何能做好，却大是值得考究和商榷。一则理论建构本身就相当艰难而复杂，也涉及一个如何博采众长、化用资源、创生自我的过程，这其中不仅有面对理论海洋的阅读和理解性挑战，也有一个资源内部本身的众声喧哗、博弈相竞的问题。仅就侨易学而论，我也期待谭渊教授能有更加细致的个案深入和反思意识的相关发覆，因为它本身就在构建过程中，其理论空间的可开发性还是相当之大的。

① Tan, Yuan, *Der Chinese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chinesischer Figuren in den Werken von Schiller, Döblin und Brecht*, Göttingen: Cuvillier Verlag, 2007.

② 谭渊：《歌德席勒笔下的“中国公主”与“中国女诗人”——1800年前后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德影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当然，谭渊所拥有的不仅是对理论的关注热情，而且也有扎实的史料功夫。他将德语文学的中国叙述追溯到13世纪初，就是用史料来说话。他揭示的另一个现象也同样值得关注，即德语文学家中极少有人踏足中国，他认为：“作家们在借助传教士报告、游记、丝绸、瓷器了解这个对他们而言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时，各种各样的想象、误读、渴望也被叠加在中国形象之上，这些真真假假的‘中国知识’共同构成西方作家塑造中国‘他者’形象的创作源泉。”在这里，书面文字记录和实物器具等同样进入考察视野，不仅显示了作者关注的广度和理论的兴趣，而且也意味着必须有对实证史料的扎实把握，在这个方面，作者虽是日耳曼学出身，但对德国汉学研究成果也是不陌生的。

任何一种研究，都必须以学术史意识作为必要前提，否则很容易流于自说自话。说到底，学术研究必须在特定的知识空间产生“对话辩难”，否则意义终究是有限的。就此来说，在本学科学者里，谭渊显然可谓佼佼者，他对中德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史谱系梳理，自有其特色，可以为后来人提供基本线索。如果能更具学术史眼光和代际谱系意识，乃至自身的架构设置，那么其对学术推进的意义则可更上层楼。

观赏经由德国作家之手而重塑的中国女性图卷，确实感慨良多。从17世纪巴洛克小说中的“中国亚马孙人”到18世纪的“中国风尚”与席勒笔下的“中国公主”，再到19世纪东学西渐与歌德对“中国女诗人”的塑造，20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女强人”——从上海女织工到四川女强人，作者给我们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而千变万化的“中国女性”帙卷，至于所附嘉庆十年版《百美新咏》插图及诗文、奥托·冯·比尔鲍姆《褒家的漂亮姑娘》译文等材料，更是让我们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表述心生向往。其实《好逑传》早就有穆尔(Christoph Gottlieb von Murr, 1733—1811)的德译本，译者还曾向席勒寄赠，由此使得席勒、歌德等人对这部中国小说有亲切的了解。歌德对《百美新咏》也是情有独钟，譬如一则关于梅妃的故事，原诗相当白描：“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作为明皇宠妃的梅妃

孤寂冷宫的美人凄凉，或许使歌德生出一种同情，所以中间虽经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英译中介^①，但歌德的德译诗仍然很精彩：

Du sendest Schätze, mich zu schmücken!
Den Spiegel hab' ich längst nicht angeblickt;
Seit ich entfernt von deinen Blicken,
Weiß ich nicht mehr, was ziert und schmückt.
君赠珠羞饰我容，影子凋零铜镜中。
红颜不能悦君意，何必脂粉熏香笼。^②

我们回译成中文，好像完全是另一首诗了，这或许就是文学的魅力、翻译的神奇。中国女性形象的再诗话，确实是文化史上的一个上佳命题，有各类精英参与的这一旅程，饶有趣味。而这一过程我们或许正可视为一意象侨易之旅，其所涉及的“物质位移，精神质变”的关系则更意味深长，值得细加开掘。

大体说来，学术研究是一个着急不得的过程，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更是“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必成俗学”。但随着技术的高度发展，资本的绝对驱动，人性的天赋弱点，似乎这种理想主义越来越成为“昨日黄花”。大家追逐的，似乎

① 英译文是这样的：“The eye of the Kwei flower, have been long unadorned; / Being forsaken my girdle has been wet with tear so fregret. / Since residing in other apartments, I have refused to dress, / How think by a present of pearls, to restore peace to my mind?” Thoms, Peter Perring: *Chinese Courtship—in verse*. London: Parbury, Allen, and Kinsbury; Marc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4. p. 254.

② 引自陈铨：《中德文学研究》，第96页。此处中文为作者自译。关于这首梅妃诗翻译的比较评论，参见《梅妃答明皇赠珠一诗的译文评比》，见张威廉：《德语教学随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43页。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也曾将歌德的德译文回译为中文：“承君相爱赠珠翠，我妆台久未复临，自去君旁不相见，何曾知怎样梳妆斗艳辉。”卫礼贤：《歌德与中国文化》，温晋韩译，见宗白华编：《歌德之认识》，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第268页。

更是张爱玲所谓“成名要快”的那种逻辑。可我想，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有些根本的东西是不会变的，这或许就是《易经》的伟大之处，在“变—常”之间寻找到一种合适的平衡张力，既看到万事万物的“迁变”之像，又始终不忘背后有“常道”存焉。所以，言行合一，心向大道，坚守底线，或正是吾辈学人当守之基本学术伦理，亦承古士人君子之风骨也。陈寅恪先生谓：“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这种对于学术与大势关系的判断，背后更是对学人职责的自觉承当意识，值得后来者认真思量。谭渊君正值盛年，在中德文学关系研究领域耕耘颇久，积累亦丰，若能排除外在的各类“诱惑”干扰，静心治学，其成就与贡献当深可期待。

目 录

第一章 序：福柯的笑声与“他者”的神话	1
第二章 探寻中国“她者”的足迹	7
第一节 从史料研究到形象学 ——中德文学关系史研究概述	7
第二节 探寻“她者”的轨迹 ——研究思路概述	16
第三章 17 世纪巴洛克小说中的“中国亚马孙人”	19
第一节 传教士报告与中国之门的打开	19
第二节 传奇小说《一官》与“中国亚马孙人”	27
第三节 《亚洲的俄诺干布》中受洗的“中国皇后”	36
第四节 传教小说《挑战》中被征服的“中国女皇”	41
第五节 《宽宏的统帅阿梅纽斯》中的“四川女王”	45
第六节 小结：从“中国亚马孙人”到“皈依的皇后”	48
第四章 18 世纪的“中国风尚”与席勒笔下的“中国公主”	51
第一节 18 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51
第二节 欧洲舞台上的“中国风尚”	64

第三节	席勒笔下的“中国公主”与中国智慧	72
第四节	席勒笔下的“中国公主”与女权思想	79
第五节	席勒对“中国公主”内心世界的刻画	90
第六节	小结：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公主”	103
第五章	19 世纪东学西渐与歌德对“中国女诗人”的塑造	113
第一节	东学西渐背景下歌德与中国文学的接触	113
第二节	“她者”与自然的交融 ——歌德对《薛瑶英》的改写	120
第三节	高贵的女诗人 ——歌德对《梅妃》和《冯小怜》的改写	129
第四节	歌德笔下追求婚姻自由的女诗人——开元	137
第五节	“中国女诗人”群像的塑造与德国的“天才女性” 之争	144
附：	嘉庆十年版《百美新咏》插图及诗文	155
第六章	20 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女强人”	157
	——从上海女织工到四川女强人	157
第一节	20 世纪德国汉学的发展对中国形象建构的影响	157
第二节	比尔鲍姆与黑塞笔下的后宫女强人——褒姒	160
第三节	德布林与克拉朋特笔下觉醒的女性——海棠	177
第四节	《泰扬觉醒》 ——作为德国工人榜样的上海女工	192
第五节	布莱希特笔下的“四川好人” ——作为寓言的“她者”	202
第七章	结语：表现“她者”与言说“自我”	214

附录	221
附录一：《褒家的漂亮姑娘(节选)》(1899)	221
附录二：《灰阑记(节选)》(1925)	237
附录三：《我为什么写“泰扬觉醒”？》(1951)	265
参考文献	269
后记：扬帆十年再启航	296
致谢	299

第一章 序：福柯的笑声 与“他者”的神话

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曾引用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作品中的一段作为其著作《词与物》(1966)的开头,从而引发出自己关于事物分类规则与秩序的阐述。在那篇名为《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El idioma analítico de John Wilkins*)的小品文中,博尔赫斯宣称弗兰兹·库恩博士曾译介过一本名叫《天朝仁学广览》(*Emporio celestial de conocimientos benévolos*)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其中谈到中国的动物分类法,那种完全“非欧洲式”的分类方法令作为欧洲学者的福柯感到了极大的震撼。福柯这样写道:

博尔赫斯作品的一个段落,是本书的诞生地。本书诞生于阅读这个段落时发出的笑声,这种笑声动摇了我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所有熟悉的东西,这种思想具有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地理的特征。这种笑声动摇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种种事物的所有的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的方案,并且长时间地动摇并让我们担忧我们关于同与异的上千年的做法。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a)属皇帝所有的,(b)涂过香油的,(c)驯良的,(d)乳猪,(e)塞棱海妖,(f)传说中的,(g)迷路的野狗,(h)本分类法中所包括的,(i)发疯的,(j)多得数不清的,(k)用极细的驼毛笔画出来的,(l)等等,(m)刚打破了水

罐子的，(n)从远处看像苍蝇的。”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寓言向我们表明出的另一种思想具有的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①

面对“中国百科全书”看似荒诞不经的分类，思想敏锐的福柯并没有停留在质疑编撰者逻辑思维能力的层面上，而是在一瞬间品味到了作品背后那股摧毁欧洲人思维惯性的力量——那种独特的“中国式”分类法揭示出了一种不同于欧洲人思维的对世界万物“异”与“同”的认识，而对异同的认识则是将纷繁复杂的世界简化、归类为人脑易于接受的大小类别的基础，对万物类别的划分最终又决定性地影响了我们对世界应有之秩序的思考，而作为欧洲人的福柯基于“自己的思想的限度”——欧洲式的思维定势——则“完全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思考”。福柯由此入手“对自身提出问题的方式和原则进行反思”^②，进而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是按照什么思维原则将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分门别类的？“我们”头脑中所划定的万物秩序是否就是天经地义？所以福柯承认，“这一笑声动摇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种种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的方案”^③，推动他反思“我们”(欧洲人)认识世界面貌、事物秩序的原则，解析欧洲式思维定式的形成过程，最终写下解构主义的奠基之作《词与物》，又名《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对福柯所感到的不安乃至于懊恼，张隆溪在《非我的神话——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中点评道：

①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 页。下画线为笔者所加。

②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4 页。

③ 赵旭东：《从质疑秩序到质疑文化》，载《民俗研究》2003 年第 3 期。